

# 日常反抗與權力角逐

## ——評王笛《那間街角的茶鋪》

● 吳曉璐



王笛關於成都茶館以及成都的微觀世界相關研究，聚焦於公共空間及其中的權力結構，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、信息流動與交換，是如何影響權力結構的。新作《那間街角的茶鋪》在史料、寫作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有所推進。

王笛：《那間街角的茶鋪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1）。

王笛新作《那間街角的茶鋪》（以下簡稱《茶鋪》，引用只註頁碼），前承他此前的微觀研究，在史料、寫作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有所推進。王笛關於成都茶館（又稱「茶鋪」）

以及成都的微觀世界相關研究，聚焦於公共空間及其中的權力結構，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、信息流動與交換，是如何影響權力結構的<sup>①</sup>；而公共領域是茶館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。受到哈貝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關於「公共領域」的理論影響，中西學者都從不同角度對公共領域有所討論。李金銓主要討論了中國近代報刊是否對公共領域有所促進的問題<sup>②</sup>。羅威廉（William T. Rowe）將視角延伸到「一個能容許有地方產權的公共領域在〔清〕帝國晚期開始存在」的話題<sup>③</sup>。而關於社會中的信息流動，則有姜士彬（David Johnson）討論了明清社會的「信息溝通方式與權力結構如何影響人們的意識」<sup>④</sup>。日常生活史則有更多學者關注，如盧漢超關於二十世紀初上海的研究<sup>⑤</sup>。上述論著與王笛的研究旨趣可謂一脈相承，展示了近年來史學界的文化轉向。

《茶鋪》從茶館中更為微觀的各種細節入手，以反映日常習慣如

何形成一種社會力量。全書共計六個部分，可以看成是三大範疇：第一部分「成都是個大茶鋪」可視為緒論，為了引出研究問題和研究視角的開端，點出成都茶館之於當地社會結構中的重要角色；第二至五部分按時序敘述清末、抗日戰爭前、抗戰期間、國共內戰中的成都，分析部分具體研究了茶館的功能、公共空間的角色、茶館中的人（如顧客、工作人員）等與茶館相關的微觀細節，以及茶館如何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；最後一部分「茶鋪是個小成都」則是總結與對比。

## 一 為甚麼又是茶館？

第一部分在全書中所佔之比例較少，雖然只有短短六十幾頁，但是其重要性卻遠遠超出其比重：王笛相當於回顧了自己數十年的學術生涯，以及自身對於微觀史學、物質文化史、日常生活史的理解。

不同於一般學術專著的開端、緒論，總是洋洋灑灑地梳爬文獻，由此引出研究主題，本書另闢蹊徑，將作者自己的學術人生放到研究中，從而更為具象地展示了其研究對象：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。王笛從幼時在成都居住的生活經歷開始談起，引出茶館對於成都本地人的重要性：「坐茶館」既是生活習慣，更是一種隱藏的文化行為方式，並且是從小開始的長期行為，這也為後文分析茶館的功能與作用，例如作為幫助調解糾紛的「民事法庭」（頁120-21）、「袍哥」（四川哥老會）的「公口」（指活動據點，頁114）等，埋下了伏筆。成都茶館

看似類近於西方的咖啡館、酒吧，同為普通人閒暇時刻打發時間的場所、人際交往的公共空間（頁12）。王笛通過本人在中美兩國的生活經歷，解讀成都茶館如何融入生活。王笛的生活跨越了中美兩種文化，因而更能從跨文化的角度理解日常差異。

王笛正是通過這樣跨文化的對比方式，引出了其研究的視角和方法。《茶鋪》的敘事被放在物質文化史的視野下，蓋因茶館本身乃是非常具象的物質載體，與茶館相關的茶具（茶碗、茶蓋、茶船〔頁37〕）、店名（「力圖高雅和自然，諸如『訪春』、『悠閒』、『芙蓉』、『可園』等」〔頁33〕）、地理位置（「竭力擇址在商業或有自然或文化氛圍之地」〔頁33〕），乃至茶館裏使用的熱水（為節省柴火，不少成都市民直接從茶館購買熱水〔頁31〕）、熱水瓶（抗戰勝利後不少茶館引入熱水瓶，不再燒開水泡茶〔頁47-48〕），都是微觀史學青睞的研究對象。它們反映社會中很多深層次的運作模式，如茶館的資金與商業運作模式、茶館中的性別因素、外部力量對於茶館的影響、國家與地方的權力鬥爭等。

從這個視角出發，本書一開始就回答了一個根本性問題：對於茶館的研究，有何必要？這正是日常生活史的魅力所在：從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物入手，挖掘其深層次的文化意涵：日常生活中的習慣、人際關係等因素，反映出社會結構如何構成及其背後的運行邏輯，人們如何在這種社會結構下找到生存之道、解決糾紛方法，以及當這種既有的社會結構遇到外部力量（例如

從微觀史學視角出發，本書一開始就回答了一個根本性問題：對於茶館的研究，有何必要？這正是日常生活史的魅力所在：從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物入手，挖掘其深層次的文化意涵。